考古人類學刊・第 76 期・頁 5-32・2012

考古資料的脈絡分析：以瑪瑙珠與硬陶甕為例談起

張 光 仁

摘　要

歷史考古學的貢獻，不僅在於增加新的出土文物，而且是提供具有時空脈絡訊息的出土材料。考古資料的脈絡訊息，在透過有系統的分析探討後，才形成真正有價值的歷史知識。臺灣歷史考古學的一項重要課題，是關於臺灣在參與到早期現代世界體系形成過程中，外來物品進入到臺灣本土的物的意義與價值體系的探討，而這個課題必須要透過有系統的脈絡分析考古資料方得以有效探討。

本文的目的有二：一方面透過檢討東南亞考古學與民族學對於瑪瑙珠與硬陶甕兩項物品的研究，嘗試說明外來物轉化為原生物的物質文化變遷，對考古學研究所具有的意義與挑戰。這兩類物品都是臺灣與島嶼東南亞歷史考古脈絡中經常接觸到的外來物品，考古科學日新月異的進展，對於所謂外來物質的分析成果推陳出新，不斷更新我們對於出土遺物的認識。然而民族誌資料顯示許多東南亞社會，會將所珍視的瑪瑙珠以及硬陶甕認定為傳自祖先的原生器物，即使科學分析證實為外來物品。考古學研究不當過於熱衷於科學分析技術的進展，只是在證實出土遺物的原料或技術來源，還必須與社會文化理論攜手，關切外來物品在特定遺址脈絡中的角色與意義，探討特定社會所展現在物質文化上的異／我之分，及其變遷。畢竟這方是朝向考古學者所試圖理解的社會文化議題。

第二部分則透過兩個研究個案的探討，說明如何透過遺物出土脈絡的空間分佈、伴隨模式等變項，據此探索考古學如何理解物品價值的課題。近年來人文社會科學理論在物質文化方面的探討，改進了考古學在這方面的研究方法。物的價值體系展現在特定脈絡中對於不同物品的差別待遇，在考古學研究中則可以透過對於出土遺物的脈絡分析，特別是空間分佈的差異模式，以及器物伴隨出土的模式等現象的細膩分析，來合理的推論、建構可能的物品價值體系。透過歐洲東地中海青銅時代的美錫尼類型陶器研究，以及菲律賓呂宋島上，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期現代時期墓葬群中的貿易陶瓷研究，本文嘗試說明此種研究取向的可行貢獻。

關鍵字：外來物品、瑪瑙珠、硬陶甕、物質文化、脈絡分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考古人類學刊・第 76 期・頁 5-32・2012

Context Analysis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Case Studies in Agate Beads and Stoneware Jars in Southeast Asia

Kuang-jen Cha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historical archaeology is not to pile up newly discovered objects but to provide contextual information for unearthed materials. One of the key issues in Taiwanese historical archaeology is how exotic goods were integrated into the existing meaning and value systems of local objects in Taiwan pursuant to particip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system. This question could produce valuable historical knowledge through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with contextual information.

This paper serves two purposes: firstly, to examine how exogenous materials become treated as indigenous objects via the archaeological and ethnographic studies of agate beads and stoneware jars in Southeast Asia, two types of objects commonly discussed in Taiwanese and Island Southeast Asian historical archaeology. Continuing advances in the archaeological sciences constantly renew our understanding of unearthed objects. However, ethnographic evidence shows many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treat those cherished agate beads and stoneware jars as indigenous objects passed down from their ancestors, even though those same objects were shown by scientific analysis to be exogenous materials. This tells us that archaeological study should be more than the scientific analysis of an object's geographic and technological origin; it needs to take into account of socio-cultural theories in order to appreciate the role and meaning of exotic objects within specific contexts, which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archaeological study.

* Honorary Research Associat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K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second purpose is to examine how value could be studied archaeologically by utilising information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association of discovered objects. Recent advances in the study of material culture have improved archaeological understanding,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valuation system could be reconstructed by looking at the differentiation of usage in specific contexts. In other words, a reasonable reconstruction of a value system could be made by a detailed context analysis, especially the spatial pattern of discoveries and association of object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pproach this issue using two case-studies: one of pottery in the Bronze Age of East Mediterranean, and another dealing with trade ceramics found in early modern Luzon in the Philippines.

Keywords: Exotic objects, agate beads, stoneware jars, material culture, context analysi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歷史考古學與臺灣史研究

歷史考古學在臺灣的發展狀況，和 Leland Ferguson（1992：xl）討論非洲裔美國人的考古學研究發展，兩者間有許多異曲同工之處：一方面，多數從事歷史考古學研究者都缺乏臺灣史的學院史學訓練背景，另一方面，當臺灣史學者已經寫作出諸如〈小琉球原住民的消失—重拾失落臺灣歷史之一頁〉（曹永和、包樂史 2000），這種將殘破的考古證據完整綴合於文獻史料脈絡中的經典之作，歷史考古學方面的研究成績相對來說顯得保守、延宕、消沈許多。

當然，也正如考古學家 James Deetz 對於美國歷史考古學研究發展的觀察與批判相類似（Deetz 1991：2），歷史考古學在台灣的發展一方面受到更早起步的史前考古學的滋養與影響，另一方面卻也免不了相關的牽絆。正反兩方面的利害得失，臺灣考古學者雖然尚未深入探討，但是都有所警覺與反省（臧振華 1990, 1997；臧振華、高有德、劉益昌 1993；劉益昌 1995, 1998）。

臺灣歷史時代早期的研究，基本上可以視為臺灣參與到更廣大的現代世界形成過程的歷史，在此一歷史過程中，貿易、交換與物品的流動，可以說是臺灣歷史考古學研究的核心課題之一（王淑津、劉益昌 2007）。對於外來物品的關注，向來是考古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幾乎在絕大多數的考古遺址中，考古學者都能發現材料、技術或者形制風格並不屬於當地的「異物」。傳統上，考古學者以形制風格的差異來討論可能的來源。感謝當代自然科學知識與技術的進步，材料科學分析技術提供考古科學多樣利器（Brothwell and Pollard 2001；Henderson 2000），足供解決許多迷團。理論上來說，只要能夠對所有樣本進行分析，並且有足夠的分析資料庫可供參考對比，似乎我們就有機會解答所有疑似外來物質的材料來源問題。近年來台灣考古學研究在這方面的發展，無論史前時代（例如：Iizuka and Hung 2005）或者歷史時期（例如：Chen 2007），都頗有嶄新的收穫與進展。

然而，如果對於所謂外來物品的理解僅止於對於材料來源的追溯，或者只是以遺址中是否發現某種屬於某地來源的「異物」，就推論兩地之間存在直接交流甚或貿易互動，而忽略了「異物」出土脈絡的探討，這是無法滿足考古學者的。就如同珠子研究的專家 Peter Francis，在他的《Asia's Maritime Bead Trade》一書中最後說的：「我們真正的興趣並不在珠子本身，而是這些珠子所能告訴我們關於參與其中的人們。」（Francis 2002：193）考古學研究的目的終究在於透過物質的遺留去理解過去人類社會文化的各個層面，因此學者所面對的考古證據乃是存在特定社會文化脈絡中的具體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品，而非單純的外來或本土的物質材料。就考古遺物而言，從原材料的取得，歷經各階段製作技術的加工，同時賦予型制、裝飾等各種不同的器物風格特徵，才初步成為一件在社會中為人所用的物品。在這過程中，材料可以是外來的，技術也一樣可能是由外地引進的，風格更可以是充滿異國風情的。所謂外來的物品，可以是說整件物品就是外來的，也可能是原料外來的，但是在本地製作的，也可以指涉運用本地的材料所製作的外來風格的物品。所以如果從材料、技術、與形制風格等三項指標，再區分予本土與外來兩項原則，則可以得出八種組合（表 1）。這其中除了組合的兩端可以說是純粹的舶來品與土產品之外，其他的組合就不容易加以定義了。可見得在考古遺址中所遇到的外來物品，在實際社會文化脈絡中其實充滿了多種可能。

表1　外來與本土兩變項與物品之材料、技術、風格三種條件之組合。

外來材料	外來技術	外來風格	舶來品
外來材料	外來技術	本土風格	訂製品？
外來材料	本土技術	外來風格	仿製品？
外來材料	本土技術	本土風格	（原物料貿易？）
本土材料	外來技術	外來風格	（技術轉移？）
本土材料	外來技術	本土風格	（技術轉移？）
本土材料	本土技術	外來風格	仿製品？
本土材料	本土技術	本土風格	土產品

對於台灣歷史考古學研究而言，同樣不可能僅止於外來物品來源地的追究，或者輕率的互動關係推論而已。考古出土材料對於人類歷史知識的貢獻，不僅在於增加新的出土材料，而且是提供具有時空脈絡訊息的考古資料，出土材料的脈絡訊息，在透過有系統的分析探討後，才得以形成真正有價值的歷史知識。這一點對於歷史考古學也是同樣重要。臺灣歷史考古學的一項重要課題，就是關於臺灣在參與到早期現代（early modern）世界體系形成過程中，外來物品進入到臺灣本土的物的意義與價值體系的探討。過去十多年來，這方面的探討已經在台灣歷史考古學界引起相當的共鳴（王淑津、劉益昌 2007；謝艾倫 2009），然而在分析方法上，具有脈絡訊息之考古出土材料的系統性分析，則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殊為可惜。

雖然脈絡分析自 1980 年代起即由 Ian Hodder 等「後歷程考古學者（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ists）」所提出（Hodder 1987），[1] 但是基本上仍是一個持續發展中，仍有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深化的研究方法與課題，要在這方面有所突破，得有更多更細膩的出土遺物的脈絡分析，在理論探討與實務分析兩方面缺一不可。本文的目的乃嘗試從兩個方向探討此一課題。第一部份旨在討論無論一件物品的「外來」本質在科學分析上是如何的確立，在其存在的社會中卻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文化理解。忽略了本土社會文化對於「物品」理解的考古學研究是不完整的。[2] 在這部分，本文將以瑪瑙珠與硬陶甕這兩類在台灣和東南亞歷史考古脈絡中經常遭遇的外來器物為例，[3] 配合東南亞考古學界近年來對於當地出土的瑪瑙珠與硬陶甕的研究發展，以及東南亞民族誌中關於瑪瑙珠與硬陶甕的資料，呈顯外來物品在特定物質文化脈絡中的價值與轉變，以及所觸及對於外來物品研究的社會文化課題。第二部分則試圖透過兩個研究個案的探討，說明如何透過遺物出土脈絡的空間分佈、伴隨模式等變項，據此探索外來物品價值模式的課題。

東南亞考古脈絡中的瑪瑙珠與硬陶甕

選擇瑪瑙珠與硬陶甕這兩類物品來討論，一方面是因為材料上的特性，使它們保存成為考古證據的機會遠高於其他性質的東西，也使得這兩項物品成為學者理解長程海上貿易及其相關問題的關鍵證據。另一方面是這兩類物品在東南亞考古的歷史文化脈絡，與和在台灣出土的脈絡類似，都是具有強烈對外接觸指標性質的物品，雖然在台灣出現的年代普遍來說晚於在其他東南亞地區。而瑪瑙珠與硬陶甕兩者所涉及的年代也有相當的差距，源自印度的瑪瑙珠出現在東南亞已經超過兩千五百年，陶瓷器則要到了唐代中國之後才出現。但是檢視學者探討瑪瑙珠與陶瓷器的論述，卻可以發現兩者存在驚人的相似性。印度作為瑪瑙珠的主要產地與材料來源，東南亞考古出土的珠子經常被視為當地受到印度影響的主要證據（Glover 1990：47）。同樣的，中國作為瓷器的發明國與重要產地，在東南亞發現的瓷器亦經常被認為是當地受到中華文化影響的重要證物（徐本章、葉文程 1993）。[4]

這樣的傳播論說法其實並不令人感到訝異。然而隨著材料分析的技術與結果的增進，對於兩類物品的物理與化學性質的理解，展現的是複雜多樣的可能性：材料、技術與風格的來源都不是那麼純粹單一的。透過這些物品所顯示當時當地的對外關係，原先單方面影響的傳播論論述已經被多數學者所放棄，取而代之的是強調東南亞本土社會的積極主動性，[5] 對於珠子與瓷器的多樣性，考古學者轉而提出「人才引入」、「技術轉移」與「訂貨採購」等等的解釋（Bellina 2003, 20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然而無論是考古科學分析成果的進步，或者是新的解釋模式的提出，對於真正理解瑪瑙珠與硬陶甕等所謂外來物品的社會文化性質，可能還存在相當的落差。具體的例子來自許多東南亞民族誌的資料。在許多東南亞部落社會中，瑪瑙珠與硬陶甕並非來自外地的「外來物」，而是傳自祖先的「原生物」（Barbosa 1992；Harrisson 1986；Janowski 1998）。雖然與祖先有關的「原生物」不盡然都是當地本土的物品，但是經由一系列「再脈絡化」的過程，原先外來的物品就轉化為當地社會「自己」的東西，而有別於更後來新近的「外來物」（陳文德 2004：91）。事實上，這種「再脈絡化」的現象不只是跨越異時限的歷史過程而已，同時也是一種同時限的現象。特別是社會中的神聖或珍貴的物品，經常需要區辨與再吸納的程序，才能取得特定的社會文化地位（林瑋嬪 2004）。不管是異時限或者同時限的現象與行為，區分外/內、異/我、外來/原生，無論是抽象的心理認同，或者落實在物質文化的展現上，對任何一個人類社會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的（黃應貴 2004）。

瑪瑙珠（agate beads）

近年來東南亞考古學界對於當地考古脈絡中出土的珠子，特別是關於瑪瑙珠（agate or carnelian beads）[6] 的來源與傳播，出現了許多突破性的研究進展。這其中相當一部份牽涉到材料分析技術的新發展，讓考古學者對於瑪瑙珠的來源，以及相關的製作技術有了新認識。

印度是全世界最主要的瑪瑙與紅玉髓礦的產地，同時也有著極其古老的珠子製作傳統（Deo 2000：31-34）。印度河流域出土的瑪瑙珠，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而其製作傳統甚至一直流傳至今。除了使用天然的瑪瑙與紅玉髓材料，著色（tinting, painting and banded）、蝕刻（etched）、加熱（heating）等加工技術也有同樣古老的歷史（Deo 2000：31-34）。傳統以來的認識，印度的瑪瑙珠不只向東傳到東南亞地區，同時也西傳地中海與西亞諸地。在探討印度與東地中海地區古代貿易與文化交流的課題中，瑪瑙珠同樣扮演重要的考古證據。

目前所知東南亞出土最早的瑪瑙珠，發現於泰國湄南河口的一處青銅時代遺址（Higham 2002：147-151），[7] 不過除了極少數例外，[8] 鐵器時代（約當 500 BC 至 AD 500）還是東南亞出土瑪瑙珠最豐富的時期。因為印度瑪瑙珠的古老傳統，使得東南亞出土的瑪瑙珠，[9] 長久以來經常被認定是來自於印度。特別是印度東南部的 Arikamedu，[10] 因為其豐富的考古出土資料，多年來都被認定為最早的甚至唯一的珠子產地，包括瑪瑙珠與玻璃珠（Francis 1991；Lamb 19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rikamedu 有著豐富充足的資料可以證明它確實是個重要的珠子生產中心，許多東南亞出土的瑪瑙珠似乎都可以在此地找到出產證明。然而，至少兩項因素讓考古學者很早就懷疑此地是否為唯一的產地：第一，Arikamedu 本地並不出產瑪瑙礦，珠子的原材料其實是外地來的。雖然印度富藏瑪瑙礦，但是特定遺址的確實礦源至今未明（Francis 1991: 36）。既然礦料可以輸出，那麼工匠或者製作技術也就一樣可能輸出了，或者至少珠子的生產可能不僅限於一地。第二，馬來半島上的 Kuala Selinsing 遺址[11]出土有製作珠子的證據。這個濱臨印度洋的海岸聚落，除了出土許多來自印度的遺物，還有製作玻璃珠與瑪瑙珠的具體證據。雖然學者還很難確認製作珠子的確切年代，但是東南亞在西元後第一個千年期間已經開始製作珠子卻是可以肯定的。

雖然有這些疑點，但是因為考古資料還不是很多，系統的探討這個問題的研究也還沒有真正展開。但是隨著愈來愈多材料的出現，學者不只在其他印度東南部同時代的遺址找到製作珠子的證據，也在更多的東南亞遺址找到製作珠子的證據，例如馬來半島上的 Khuan Lukpad，爪哇島西部的 Buni，以及著名的越南南部湄公河口的 Oc Eo 遺址，都出土有許多半成品、原料、甚至廢料。加上東南亞也出現有幾處紅玉髓礦，例如爪哇島西部，蘇門答臘島東部，以及泰國中部都有礦源的報告。東南亞考古學界不得不認真檢討先前關於這些瑪瑙珠都來自於印度的假設是否仍然成立。衍生的相關問題還包括例如：東南亞自己的瑪瑙或紅玉髓礦是否早在鐵器時代就已經加以開採運用了？無論礦材來源如何，瑪瑙珠是否也有東南亞本地製作的？如果有在東南亞製作的瑪瑙珠，其工匠或者製造技術是源自印度或者東南亞自身的傳統？諸如此類的問題自 1980 年代以來，逐漸成為學者研究東南亞瑪瑙珠的核心課題。最近的兩項研究成果，從材料與製作技術兩個層面，比較有系統的分析了這方面的資料，也檢討了傳統的解釋模式，雖然都還是相當初步的研究成果，但是具體的解答了一些問題，也指引出未來的研究發展方向，值得加以重視。

在瑪瑙珠材料分析方面，澳洲學者 R. Theunissen，P. Grave，與 G. Bailey 等人，運用非破壞性的 PIXE/PIGME[12] 放射線分析技術，對來自泰國、斯里蘭卡、與印度，七個地點的 53 件珠子、製作廢料或礦物樣本進行了比較分析。結果顯示泰國出土的瑪瑙珠，在礦物成分組成上顯示明顯有別於印度的（Theunissen, Grave and Bailey 2000：97）。這個結果相當程度促使學者不得不認真檢討泰國的瑪瑙珠的原料並非來自於印度的可能性。在另一方面，泰國珠子與許多斯里蘭卡的瑪瑙珠，以及泰國的瑪瑙礦材，在主成分分析的統計分佈上有所重疊。這一點雖然不能完全證明兩者來自相同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源，但是卻也不能排除其可能性。

除了珠子材料的分析，法國學者 Bellina 由民族學者研究珠子製作的成果出發，注意到珠子的製作技術通常具有相當的地方特殊性，不同的研磨完工的技術，會在珠子表面留下不同的痕跡。所以即使是材料型制相同的珠子，也可能透過這種痕跡對比來察看是否出於同樣製作技術。Bellina（2003）運用細緻的製作痕跡分析，[13] 配合對珠子的材料、型制、大小、與穿孔等指標資料，對 560 顆來自印度 16 個遺址的珠子，以及 860 顆來自 28 個東南亞遺址的的瑪瑙珠進行了比對，結果顯示以下幾個特性：

印度與東南亞出土的瑪瑙珠之間的差異，在不同時期有很大的差異。例如東南亞早期（西元前幾個世紀）出土的珠子，和同時期印度出土的珠子比較起來，在製作技術上的差異不大，珠子的大小則稍微小一些。雖然有不少類型是東南亞各地出土的比率遠高於印度出土者，但是東南亞還未發現屬於這個時期的珠子作坊，所以這個時期的珠子看來還是以印度製作的可能性較大。

至於東南亞比較晚期（西元後）的珠子，在製作工藝上已經出現不少明顯有別於印度珠子的技術了，其數量與類型則都相對減少，大小則和同時期印度的珠子相當。屬於這個時期的作坊則開始出現在東南亞地區。

這兩項關於瑪瑙珠的研究雖然都還算是初步的成果，但是因為先前的討論認定瑪瑙珠和印度的關係如此密切，加上瑪瑙珠被視為一種具有特殊社會地位與價值的珍貴物品，在東南亞考古脈絡中出土的瑪瑙珠經常被用以佐證印度文化對於當地的強烈影響，成為所謂東南亞印度化 [14] 的充分證據。目前的研究雖然仍然同意最早的瑪瑙珠應該是來自印度（Glover and Bellina 2001），但是都強烈認為東南亞當地很快的就吸納了這類物品。例如說上述法國學者 Bellina 甚至認為，印度技術加上東南亞類型的組合，顯示西元前幾世紀，兩地之間就已經建立了密切的交易關係，甚至是東南亞當地對印度珠子作坊的“訂貨”結果（Bellina 2003：291）。

硬陶甕（stoneware jars）

做為體現南海貿易歷史與內容的主要物質證據，瑪瑙珠所受到的注意以及解釋的轉變，無獨有偶的和硬陶甕 [15] 出現有趣的對比與類比。

硬陶甕可以說是各種貿易陶瓷中最不受到學者重視的一類。關於他們的研究在整個陶瓷研究文獻中可以說是九牛一毛。這或許是因為在學者與鑑賞家眼中，它並不具有優美精緻的造型與釉色。不過它在學術界所受到的忽視，無損於它在東南亞的獨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地位。從菲律賓呂宋島北部山地（Barbosa 1992），到婆羅洲內陸（Harrisson 1986；Janowski 1998：237），到蘇拉威西南部，硬陶甕和瑪瑙珠一樣，在許多部落的社會繁衍機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身為南海貿易的要角之一，硬陶甕在許多沈船遺址中都未缺席（Goddio 2002），雖然光芒往往被其他貿易瓷所遮掩。

關於硬陶甕的產地來源的探索，東南亞考古學者早期都直接指向中國的福建和廣東地區，至於年代則甚至可以早到唐代（請參見 Harrisson 1986：31）。1960 年代以後開始出現有湖南長沙窯與浙江越窯，以及其他中國各地窯址的說法。但是此一同時起，其他大陸東南亞地區陶瓷燒造的考古證據也浮上抬面，包括越南、泰國、柬普寨、與緬甸等許多地區都發現越來越多的生產證據（Grave and Maccheroni 2009）。至於年代，對於中國的產品大多認為是唐宋時期的產物，而其他東南亞的硬陶甕被認為是屬於西元後第二個千年期間的產品，特別是十四世紀以後的物品（Harrisson 1986；Long 1992）。

就如同所有其他貿易陶瓷的研究一樣，對於出土器物產地來源的鑑定，相當大程度受制於我們對於生產地的認識，也就是窯址的研究。在福建廣東的許多窯址被認真研究之前，景德鎮幾乎是所有東南亞貿易瓷的產地。然後當諸如福建德化窯、廣東西村窯發現之後，所有民窯產品又似乎都指向這兩個地區，直到景德鎮周邊地區的窯址被進一步發現研究才又有所改觀。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其他東南亞地區的窯址研究上。在目前的實務上，非科學分析性的陶瓷器來源鑑定，與其說是門科學知識，還更近於一種藝術技能。

至於可能是比較客觀獨立的考古科學分析資料，因為瓷器和硬陶不同於技術程度較低的陶器，超過攝氏一千度以上的燒成溫度，使得許多礦物成分因而在燒製過程中產生變化，因此最便宜簡單的切片分析礦物組成的方法，運用在硬陶與瓷器上有其困難。[16] 近年來開始有學者運用更高階的地球化學分析技術，對瓷器與硬陶樣本進行分析，並且獲致令人振奮的初步成果。例如 Grave and Maccheroni（2009）運用「感應耦合電漿放射質譜法（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Optical Emission Spectrometry，ICP-OES)」，分析八百多件來自亞洲各地（以十六、十七世紀東南亞沈船資料為主）的硬陶甕樣本，將測量所得的硬陶片所含主要、次要與微量化學元素，以「來源地假定（provenance postulate）」的理論基礎，透過幾種多變項分析技術的統計方法呈現分析結果，確認這些硬陶甕在化學元素組成上可以粗分為（主要在鈣、鎂、鈉上有所差異的）A、B 兩大類。另外又運用掃瞄電子顯微鏡（SEM）與 X 光偵測繪圖顯像技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ADX X-ray mapping）輔助觀察陶瓷片的成份結構，區分出可以代表不同地質來源的 13 群（A 類 9 群，B 類 4 群）陶片，可能和傳統上所認知的許多生產地點可以有所聯繫。雖然這個研究還只能提供相對的科學證據，但是已經開啟了相當的可能性，值得密切注意其發展成績。只是這類科學分析研究還得特別注意標本取樣與統計解釋方面的嚴謹性。忽略了這兩點，往往會使得科學分析資料對於考古學的解釋一無是處。

從外來物到原生物

鑑定器物的來源當然是考古學研究的重要課題，無論是年代、材料、技術，都是值得考究的。儘管考古科學分析有許多方面的困難，以及資料解讀上需要謹慎之處，但是整體而言，它仍然是提供考古學者最紮實可靠的證據來源。然而，從確認來源到據此來推論相關的議題，特別是當地社會對外的互動關係、物的價值乃至於整個社會經濟變遷等等的議題，則需要相當小心、細膩的論證過程。一個值得參考的民族誌例證是：同樣是瑪瑙珠與硬陶甕，同樣在島嶼東南亞的脈絡，考古科學上對物品所證實的外來/本土之分，與當地社會文化脈絡中所認知的異/我之別有相當的差距。

對於婆羅洲北部的 Kelabit 人而言，珠子是備受歡迎的裝飾品，不管男女老少都配戴各色珠子串成的項鍊與帽子（Janowski 1998）。雖然 Kelabit 人從鄰近異族買入珠子，也熟知許多頗有價值的珠子是來自何方，但是他們堅持一些最有價值的珠子，特別是許多瑪瑙珠，乃是傳自祖先。沒有 Kelabit 人能夠為這些珠子定價，甚至從來沒有想過可以去購買這些特別的珠子。

同樣的，對於婆羅洲的 Dayak 人而言，這些大小、裝飾不一的硬陶甕，也同樣是來自祖先的遺產（Harrisson 1986：23-32）。根據傳說，Dayak 的祖先來自爪哇島上的滿者伯夷王國（Majapahit），硬陶甕則是治好國王掌上明珠怪病的一位神仙所製作，要留給子孫後代的遺產。在傳說中，因為要保護這些陶甕的圍籬沒有按照規定好好做，結果有些陶甕像鹿一樣跑掉了。這些跑掉的甕有時候還可以在野外發現，所以這一類意外發現的甕，就叫做‘rusa’，也就是鹿的意思。至於那些緊急搶救下來的陶甕又可以分成兩類，比較珍貴的那位神仙自己做的，另外一類則是他的助手做的。這兩種甕的名稱分別是 brahan 與 belanga。

面對這些多采多姿的民族誌案例，考古學者該只是把他們當作口耳相傳的掌故，不認為他們對於考古學研究有任何特別的價值；或者考古學者應該嚴肅面對其中所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含的啟示，思考到考古遺址中所發現的外來物品，對於當時當地的人們而言也可能有同樣的物質文化意義？從這些民族誌的例子，我們看到瑪瑙珠與硬陶甕在當地社會一種特殊的物質文化展現。從礦物地質或者材料科學的角度來講，瑪瑙和硬陶顯然是外來物質。但是從社會文化脈絡來觀察，瑪瑙珠與硬陶甕在許多東南亞社會中，則歷經了由原來是「外來物（exogenous goods）」的地位，經過「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ed）」的過程，轉換為具有特定社會文化地位的「原生物（indigenous goods）」的物質文化變遷歷程。[17]

所謂「原生物」乃是特定社會文化脈絡中，被認定為是該族群「自己的」物品。這類物品多是與祖先有關的、傳統的物品，通常都具有特定相關的禁忌規範，在許多社會場合中佔有重要角色，特別是在與整個社會繁衍（social reproduction）有關的儀式中，通常被認為是不可或缺的。許多特殊的「原生物」因為具有特定的社會文化價值，該物品與其擁有者之間存在一種不能完全分割的關係（陳文德 2004：90-92；另參考 Weiner 1992），並且經常是不能用交易購買，特別是用金錢，來取得該物品的。相對來說，「外來物」因為還未能在該社會文化脈絡中取得特定的地位，其使用與流通也就沒有相關的規範禁忌。

「外來物」需要經過「再脈絡化」，方能取得具有特定社會文化意義的「原生物」地位，這個過程特別能夠展現在對於社會中的神聖或珍貴物品的要求上。例如林瑋嬪對於台灣漢人神像的分析，清楚指出木頭雕刻成像之後，神像還必須經過「賦予形體（embodiment）」與「定著一地（localization）」的兩項象徵過程，才真正具有神靈，才得到確定的社會文化地位（林瑋嬪 2004）。同樣的，對於婆羅洲的許多民族而言，瑪瑙珠與硬陶甕無論是意外拾獲或者透過交易取得，都必須經過村落長者的討論，共同認可為祖先所傳者，方得以原生物的地位留在村子裡，並且該物品又透過一再的參與各種儀式，逐步獲得更密切的認同與更高的社會價值（Harrisson 1986：21）。不只是社會中神聖的或珍貴的物品，通常要經過必要的儀式程序，才能取得特定的社會文化地位。對於許多外來的異物也經常如此。例如 Helms（1988）透過一系列的民族誌分析，探討來自遠方的異物，包括地理與異文化知識在內，常被視為神聖與珍貴的，而在經過吸納之後，經常成為政治權利的要項。

然而「原生物」與「外來物」的區分，是不能夠從靜態的時間切面來理解的，而必須放在一種動態的架構來思考（陳文德 2004：96；另參見 Thomas 1991）。例如說，「原生物」並不必然在材料來源上就是原生的。陳文德舉卑南人的小米為例：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米相對原來作物的稷，「既有的不同版本的傳說都指出它是來自於「異族」。然而，重要地是，小米種子係由一對夫妻的祖先帶回來種在土地上，藉由之後的一系列儀式的舉行，外來的小米就轉換為「自己」的作物，同時與後來傳入的水稻區隔（陳文德 2004：91）。」同樣的區辨與吸納原則，也展現在近代對於卑南人「織」與「繡」製禮服的對待上（陳文德 2004）。這些例子清楚的顯示出，「原生物」與「外來物」的區分與內涵，是一種動態的過程，不同時期各有其標準與內容。原先的「外來物」，經由一系列儀式的「再脈絡化」，可以取得「原生物」社會文化意義，而有別於更後來的「外來物」。

外來物品價值的脈絡分析

區分外/內、異/我、外來/原生，無論是抽象的心理認同，或者落實在物質文化的展現上，對任何一個人類社會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的。對於人類社會這種能力與展現的探討，對於物品價值變遷與轉化的議題，無論是異時限的或者同時限的，乃是社會文化理論的基本課題（黃應貴 2004）。考古學者在這方面往往以社會經濟或文化品味的變遷或差異，抽象而簡化的解釋帶過。例如前文所提 Bellina 對於瑪瑙珠的研究，雖然已經注意到可能存在印度傳來的與東南亞本土發展的兩種製作技術上的差異，並且用來論證瑪瑙珠並不完全是由印度生產外銷來東南亞的，進而推論認為這是東南亞當地的社會領導菁英，主動引入、消納印度文化的結果，以有別於先前認為印度文化主動侵入、而東南亞人被動接受的歷史解釋模式（Bellina 2003：295）。然而這樣的論證過程中，我們對於瑪瑙珠在這個變遷機制的角色與地位仍然不清楚，對於瑪瑙珠如何在當地社會的物體系中取得其存在地位也還有待釐清。

如何將此一看似抽象的，探討物品價值的議題，在研究方法上落實於物質遺留的分析上，實屬不易。例如說，雖然認識到有不同的生產技術，但是當時當地的人們對於不同來源或者技術所生產的瑪瑙珠，在物質文化的展現上是否有所差別？又例如這樣的差別待遇隨著時間與時代的推展而有所演變？諸如此類問題都是銜接我們對於器物的理解與更大的歷史解釋之間，所必須詳加考察的。在考古學研究上要對諸如此類的課題認識有所進展，至少必須知道特定遺址中各件遺物的確定出土位置，然後透過對不同類別遺物彼此間的相關性，分析不同技術所生產的珠子，是否展現出不同的分佈與相關模式，方能初步推論物質文化性質。而近年來世界考古學界在此一課題上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進展，乃是（重新）關注到考古學（原本就該）最關切的，對於物品出土的脈絡的分析（context）（Bailey and Mills 1998；Lesure 1999；Sherratt 1999；van Wijngaarden 1999, 2002；Voutsaki 1995, 1997）。

近年來人文社會科學理論對於物質文化探討的進展，除了增進對於物品價值的理論性理解，在考古學研究方法上也有些具體的嘗試與發展。其中一項重點是強調價值，特別是外來物品的價值，乃是消費當地社會對於該物品的一種文化判斷，而非固著於該物品生產當時的條件（例如投入生產成本的多寡）。因此對於外來物品價值的理解，事實上就是對於社會中物品價值體系的探討。而價值體系展現在物質文化上的一項原則是差異等級性（gradations of values）（Lesure 1999：27-29；亦參見 van Wijngaarden 1999：3-5；Voutsaki 1995：13），簡單的說也就是在特定脈絡中對於不同物品的差別待遇。在考古學研究中則可以透過對於出土遺物的脈絡分析，特別是空間分佈的差異模式（differentiation pattern in spatial distribution），以及器物伴隨出土（association）的模式等現象的細膩分析，來合理的推論、建構可能的物品價值體系。這方面的研究在世界考古學界亦屬探索的階段，但是一些初步具體的成果值得提出來觀摩。

首先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對於東地中海青銅時代的美錫尼類型陶器研究，這個例子特別可以和東南亞貿易瓷，甚至許多南海貿易品的研究相對照。希臘本土青銅時代晚期（約當西元前 1600-1050）所生產的陶器，一般被稱為美錫尼（Mycenaean）類型陶器，這個名稱源自當年 Heinrich Schliemann 發掘出宣稱為美錫尼王城的遺址。對於此類的陶器，歐洲學者有很詳盡的分析，包括產地、類型、年代、分佈等等都很清楚。美錫尼陶器還同時大量外銷到東地中海各地，從科西嘉島到巴勒斯坦，從土耳其到埃及尼羅河沿岸，四百多個遺址發現有希臘製的美錫尼陶器。但是這些在希臘本土以外發現的美錫尼陶器和在希臘本地大部分地區出土者，其類型上有相當的差異，學者因此推論希臘當時已經有專業的外銷陶器產業。這些外銷陶器除了一種大型的陶甕之外，絕大多數的外銷美錫尼陶器是紋飾豐富的高品質小件容器。整體而言，銷往東地中海各地的美錫尼陶器，往往因其為外銷陶器、高品質、紋飾豐富等特質，而被考古學者認為在當地是一種象徵社會地位的珍品。

然而這種把美錫尼陶器一視同仁地視為一類極具社會地位的奢侈珍品，其主要證據卻是來自少數陶器上的精美繪圖，這些圖案的主題經常被認為是象徵貴族階層生活形態的寫照。但是這些具有精美繪圖的陶器其實只佔外銷的美錫尼陶器中的一小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分，而且也僅限於極少數器型。絕大多數的陶器雖有紋飾，但是並沒有繪圖。所以其實是否可以據以推論說所有的美錫尼陶器都是貴族菁英的奢侈品，不無疑問。荷蘭學者 van Wijngaarden（1999, 2002：37-73）透過分析各種類型的美錫尼陶器在遺址內部，不同性質空間的分佈模式，探討美錫尼陶器所可能具有的在當地社會價值體系的地位。例如他針對敘利亞海岸的 Ugarit 王城遺址中，三種主要的美錫尼陶器，small stirrup jar，amphoroid krater，以及 conical rhyta，[18] 在三種主要性質空間：住宅區、墓葬區、以及宗教區中的分佈型態，做了比較分析，推論當時對於不同類型的進口美錫尼陶器有相當明顯的差別待遇：small stirrup jar 顯然在墓葬區佔有優勢，amphoroid krater 在住宅區與墓葬區都扮演一定角色，而 conical rhyta 則在住宅區與宗教區各有其地位。這個結果初步但是具體呈現了一個社會對於外來物品的價值態度。作者並且將比較分析拓展到整個東地中海九個遺址，試圖探討在不同文化脈絡中相類似物品的物質文化展現差異。

基於相近的理論探討，張光仁（Chang 2008）也嘗試對於貿易瓷在許多島嶼東南亞地區，被理所當然的視為一種奢侈珍品的說法提出質疑。他以菲律賓呂宋島西南部 Calatagan 半島上，七個西元十五到十六世紀時代的墓葬區所出土之一千多個墓葬，超過兩千件以貿易瓷與在地陶器為絕大多數的各式隨葬品為材料，分析隨葬物品在墓葬脈絡中的空間分佈與伴隨關係。進而針對幾項先前對於貿易瓷的假定看法做了檢討。例如，先前許多討論都預設了貿易瓷是一種比在地陶器更加珍貴的假設，認為高價值的貿易陶瓷會取代地位低的在地陶器，所以貿易瓷與在地陶器在數量上有一種反比關係。然而，精細的統計分析結果證明，至少在當時當地的墓葬脈絡中，這樣的反比關係是不存在的，而且事實上還有相當的正比關係存在（Chang 2008：162-5），顯示貿易瓷與在地陶器在當時當地的墓葬脈絡中，像是遵行兩套並行的價值體系，各有其角色與功能。

除了檢視先前研究的假設，張光仁（Chang 2008）也透過分析五種不同類型的貿易瓷器在墓葬中的分佈模式，嘗試揭露當時人們對於不同器物的使用模式，甚或喜好與品味取向。分析結果顯示，對於碗、盤、碟、甕、罐等五大類器型貿易瓷器的使用，彼此間確實存在明顯的差異。例如：直徑稍大的瓷盤絕大多數擺放在葬主的腹部附近上下，而較小的瓷碟則要不放置在手腳掌的位置，不然就是做為硬陶甕的蓋子使用。形體較大的硬陶甕幾乎只有放在葬主頭腳兩端，通常還覆蓋著碟子或者碗。至於小型的陶瓷罐子或者瓶子，則絕大多數置於頭部附近。相對於其他各類型，瓷碗的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用方式則較為多樣或者不那麼限制，幾乎在葬主身體周遭各處都可能使用到。可惜因為資料的限制，相關的研究無法將各類型陶瓷器做更進一步的分類研究分析，例如分析器物的紋飾是否影響器物的使用等可能。[19]

結語：對臺灣歷史考古的一點觀察

上面所提的例子，以及考古資料脈絡分析的理論與方法，都還算是相當初步的嘗試性探討。雖然距離更先前所提到的，民族誌資料所提出的從「外來物」經過「再脈絡化」，取得「原生物」地位的物質文化變遷的研究課題，顯然還有一大段路要走，但是細膩的脈絡分析指向了一條可行的方向。畢竟，考古發掘工作對於人類歷史知識的貢獻，除了添增新的出土文物，更重要的是提供具有時空脈絡訊息的考古資料。這些考古資料的脈絡訊息，在透過有系統的分析探討後，才得以形成真正有價值的歷史知識。這一點對於歷史考古學的研究也具有同樣重要的啟示。

臺灣歷史考古學的一項主要課題，在於探討外來物品於臺灣參與早期現代世界體系過程中，如何進入本土的物的意義與價值體系。過去十多年來，台灣歷史考古的發掘成果大有斬獲，然而在考古資料的深入分析方面，有系統地探討考古資料的脈絡訊息，則還未引起足夠的重視。以發掘報告至為詳盡的淇武蘭遺址為例（陳有貝等2007/8），邱鴻霖（2003）在初步討論淇武蘭遺址的墓葬時，已經提及不同隨葬品在特定墓葬中出土的相關性，並建議應當對此一課題加以探討，可惜該研究並未進一步加以申論。謝艾倫（2009）則對於同一遺址出土陶瓷器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例如她觀察對比陶瓷器在墓葬與生活層兩種不同脈絡中的差異（謝艾倫 2009：42），推測當時人們對於特定類型的外來陶瓷器已經有意地加以選擇使用。作者並且指出各類不同隨葬陶瓷器型可能與三種不同的墓葬行為有關：幾何印紋陶罐可能只是在埋葬流程中使用到的儀式用品，安平壺與瓷碗等可能只是被當作盛裝其他隨葬品或者墓葬儀式用品的容器，而只有各種瓶類、白瓷罐、軍持等，才可能是真正有意放入做為給葬主陪葬之用，甚至可能是表示葬主身份的奢侈品或威望物品。雖然謝文的討論僅止於初步的觀察，其論述的有效與否有待更有系統的分析結果加以證實。但是已經足以顯示，透過細膩的脈絡分析來理解外來物品的社會文化意義，乃是可行的重要研究取向。

無論在東南亞或者台灣的考古脈絡中，瑪瑙珠與硬陶甕都是兩項相當普遍而又具有外在連結意義的考古材料。建立在類型風格分析的基礎之上，透過考古科學分析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果的助力，考古學者對於瑪瑙珠與硬陶甕的來源與分佈，能夠有立論較為紮實的推斷。然而考古科學分析的資料，需要謹慎的推論，特別是要注意到抽樣過程與資料統計上的限制。再者，即使有了這些科學分析成果，民族誌的資料顯示，顯然是外來物品的瑪瑙珠與硬陶甕在許多土著社會中都具有特殊的社會文化地位，甚至往往被視為是祖先流傳下來的物品。以社會文化人類學的理論來論述，瑪瑙珠與硬陶甕可以被視為由原來是「外來物」的地位，經過「再脈絡化」的過程，轉換為具有特定社會文化地位的「原生物」。這種物質文化展現與變遷的現象，與當代世界考古學對於物的價值的研究趨勢不謀而合。價值體系展現在物質文化上的一項原則是差異等級性，也就是在特定脈絡中對於不同物品的差別待遇。在具體的考古學研究策略上，則需要透過對於例如出土物品的空間分佈差異模式，以及器物伴隨出土模式等現象，從事更精緻的脈絡分析，方得以合理的推論、建構可能的對於外來物品的恰當認識與知識體系。

附　註

1. 至於以美國行為學派（behavior archaeology）為主的，檢討考古脈絡中的資料在其形成過程中持續受到不同程度的自然營力，或人為作用力的改變與影響，因此質疑出土材料是否真正反映過去人類行為的實體性（reality），從而強調若是無法釐清考古遺址形成過程（archaeological formation processes）對考古資料的影響，則對進一步的考古學解釋將很難落實。這樣的批評其實只是更加強對考古脈絡探討的重要性。
2. 這種對於「物品」的「物質性（materiality）」的研究，一直是考古學的核心課題，最新的成績可以參見 Ian Hodder（2012）在理論上的全面探討，Maran and Stockhammer (2012)所編輯的論文集則主要涉及泛文化接觸中「異物」的文化轉化課題。
3. 本文的目的並非在對東南亞考古學中關於珠子與陶瓷器的發現與研究，提供一個完整討論或分析。這方面的探討資料日新月異，迅速累積，少數算是相當完整綜合論述，包括瓷器的研究方面有：John Guy（1986）與的 Roxanna Brown（1988）書仍然是重要的參考。珠子方面，Peter Francis（2002）生前最後的著作仍是至今最完整的一本相關書籍。Bellina （2007）也頗具參考價值。
4. 中國學者在討論到中國瓷器外銷的歷史意義時，近年來最常使用的兩種說法是：促進中外經濟文化友好發展，以及改善、豐富、或美化當地人民的生活水平。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類說法避免直接使用類似「中國化」的字眼，筆者以為前者反映了當前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文化，後者則不自覺透露中華文化優越觀的心態。深入分析中國學者與東南亞學者在這方面的討論與論述，不是本文的目的，卻是值得追究的學術史課題。

5. 考古學者對於東南亞古代貿易與文化交流史解釋模式的轉變，並非僅限於出土材料證據的修訂，同時也牽涉到整個東南亞史研究的論述發展。這方面的討論可以參見陳國棟（1999），楊聰榮（2001）。
6. Agate（瑪瑙）與 carnelian（紅玉髓）在礦物學上是屬於同一石英結晶系列的礦物，當未特別指明時，在本文中將兩種材料所製成的珠子合稱瑪瑙珠。
7. Nong Nor 是一處多文化層的海岸遺址，上層的青銅時代墓葬群，年代約當 1100-600 BC。其中一位男性墓葬中伴隨著四顆紅玉髓珠子。
8. 其他可能的出土瑪瑙珠的鐵器時代以前遺址，可以參見 Bellwood（1997：275）的討論。
9. 到底東南亞出土的瑪瑙珠最早的年代為何，目前還只能有個暫時性假設，因為由瑪瑙和紅玉髓這兩者所製成的器物，有時會和其他材料的器物相混淆，例如一些玻璃珠和瑪瑙珠，在某些考古埋藏條件影響下，以肉眼或者觸摸都難以區辨兩者。因此對於許多先前被鑑定為是或者不是瑪瑙珠的樣本，其實都有待重新檢驗。
10. 在印度考古學上，Arikamedu 是個相當重要的遺址。這個遺址於 1945 年由英國考古學者 R. E. M. Wheeler 首度發掘，除了出土豐富的各式珠子外，也出土相當多的羅馬帝國遺物，被認為是一個貿易港，甚至可能是羅馬帝國商人所建立的殖民港口。這個遺址在 1947-50 年與 1989 年重新發掘，新的證據顯示這個港口城市的年代可以上推到西元前 350 年。
11. Kuala Selinsing 遺址是東南亞最早發現有製作珠子證據的遺址。1932 年由 I. H. N. Evans 首度發掘（Evans 1932），當初認為是一個西元六到九世紀的貿易港。新近的發掘則把年代擴展到西元前二世紀到西元後十世紀（Nik Hassan Shuhaimi 1991）。
12. PIXE/PIGME（粒子激發 X 放射線／粒子激發 γ 放射線）都是非破壞性的高能粒子束分析技術，運用同步輻射加速器所產生的高能粒子束，通常是質子，去撞擊樣本以產生電磁輻射與帶電粒子，透過測量這些輻射與粒子，對樣本物質的化學成分做定性與定量的分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3. 因為各地的珠子樣本通常不能帶離當地，也不太允許破壞性的切片分析，所以 Bellina 用牙齒採模技術（dental elastomer print），即用塑料或矽膠模製、記錄珠子表面的加工痕跡，然後進行顯微鏡檢查。
14. 關於東南亞印度化的研究，文獻可謂充棟。綜論者可以參考 I. W. Mabbett (1977a, 1977b)的兩篇文章。
15. 本文所謂的硬陶甕，是指高度大約至少三十公分以上，高溫燒成的硬陶器，通常表面全面或部分施釉，釉色以深綠、棕色、或者黑色為主。請參考 Barbara Harrisson (1986：vii) 的研究分類定義。
16. 關於陶瓷器產地來源的考古科學分析，深入的通論可以參考 Prudence M. Rice (1987：413-425) 一書的專節 Provenience studies，以及相關段落。
17. 「外來物」與「原生物」的用詞，是筆者衍義陳文德（2004）的文章中，「外來的 （exogenous）」與「原生的 （indigenous）」兩項概念所提出的說法。陳文並未直接使用「外來物」與「原生物」這兩個詞彙，這是筆者的用法。
18. Small stirrup jar 是一種小型雙把單嘴壺，腹部有幾何線條紋飾，大小約 10-15 公分高。通常認為是用以儲存橄欖油或者香水等液體之用。Amphoroid krater 是一種大型的雙把闊口窄底壺，高約 30-50 公分，口部直徑亦可以達 20-30 公分，但是其平底卻可能只有 10 公分直徑。此種器物腹部經常有公牛、馬車、魚鳥等繪圖紋飾，被認為是貴族用以盛酒調酒之用。Conical ryhta 是一種圓錐形、大口、底狹但亦開口的單把器物，長度在 25-40 公分之間，器表上亦經常有幾何紋飾與魚鳥繪圖。
19. 菲律賓學者 Grace Barretto-Tesoro (2008：138-144) 也對同一批資料做了另一課題的分析，初步推斷當時對於當作隨葬品用的貿易瓷，在紋飾、釉色方面是有所偏好選擇的。但是因為討論的個案不多，相關的議題還需要進一步的檢視。

引用書目

王淑津、劉益昌

2007 〈十七世紀前後臺灣玻璃珠飾與煙草、煙斗的輸入網絡：一個新的交換階段〉。《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2：51-90。

林瑋嬪

2004 〈台灣漢人的神像：談神如何具象〉。刊於《物與物質文化》。黃應貴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頁 335-377。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邱鴻霖

2003 《宜蘭縣礁溪鄉淇武蘭遺址出土墓葬研究：埋葬行為與文化變遷的觀察》。台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徐本章、葉文程

1993 《德化瓷史與德化窯》。香港：華星出版社。

陳文德

2004 〈衣飾與族群認同：以南王卑南人的織與繡為例〉。刊於《物與物質文化》。黃應貴編，頁 63-110。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陳有貝、邱水金、李貞瑩

2007/2008 《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陳國棟

1999 〈「在地性歷史」、「自主性歷史」與東南亞研究〉。《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9：25-37。

黃應貴

2004 〈導論：物與物質文化〉。刊於《物與物質文化》。黃應貴編，頁 1-26。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曹永和、包樂史

2000 〈小琉球民住民的消失：重拾失落的臺灣歷史之一頁〉。刊於《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曹永和編，頁 185-237。臺北：聯經出版。

楊聰榮

2001 〈菲律賓獨立革命與西美戰爭：論東南亞自主歷史史觀下國族歷史論述的成就與侷限〉。《新史學》12（1）：187-232。

臧振華

1990 〈甚麼是歷史考古學〉。《人類與文化》26：48-50。

1997 〈考古學與台灣史〉。刊於《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頁 721-742。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臧振華、高有德、劉益昌

1993 〈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的試掘〉。《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3）：763-865。

劉益昌

1995 〈史前文化與原住民關係初步探討〉。《台灣風物》45（3）：75-90。

1998 〈臺灣西南平原地區史前時代晚期的文化〉。刊於《臺灣原住民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頁 15-40。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謝艾倫

2009 《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外來陶瓷器之相關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Bailey, Douglass and Steve Mills ed.

1998 The Archaeology of Value: Essays on Prestige and the Process of Valuation. Oxford: J. and E. Hedges.

Barbosa, Artemio C.

1992 Heirloom Jars in Philippine Rituals. In A Thousand Years of Stoneware Jars in the Philippines. C. O. Valdes, K. N. Long and A. C. Barbosa, eds. Pp. 70-92. Manila: Jar Collectors.

Barretto-Tesoro, Grace

2008 Identity and Reciprocity in 15th Century Philippines. Oxford: John and Erica Hedges Ltd.

Bellina, Bérénice

2003 Beads, Social Chang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Antiquity 77(2): 285-297.

2007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Hard Stone Ornaments (VI c. BC-VI c. AD). Paris: 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rothwell, Don R. and A. M. Pollard

2001 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s.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Brown, Roxanna

1988 The Ceramics of South-East Asia: Their Dating and Identification.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ng, Kuang-jen

2008 Social Use and Value of Trade Ceramics: An Analysis of Mortuary Practices in Calatagan, Southwest Luzon, the Philippines. Ph.D. dissertatio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In press Foreign Trade, Local Taste: A Consumption-based Study of Trade Ceramics in Late Proto-historic Island Southeast Asia. In European Materializing Southeast Asia's Past: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ists, 2008. Marijke Klokke, et al, eds.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Chen, Kwang-tzuu

2007 Scientific Analysis of the Trade Ceramics Excavated from Zeelandia: A Preliminary Repor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xchange of Material Culture over the Sea: Contacts between Europe and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16th-18th Centuries, Institute of History &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31st October- 2nd November.

Deetz, James

1991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Encounters. In Historical Archaeology in Global Perspective. Lisa Falk, ed. Pp. 1-10.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Deo, Shantaram Bhalchandra

2000 Indian Beads: A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Study. Pune: Deccan College Post-Graduate and Research Institute.

Evans, Ivor.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32 Excavations at Tanjong Rawa, Kuala Selinsing, Perak. Journal of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Museums 15(3): 79-134.

Ferguson, Leland

1992 Uncommon Ground: Archaeology and Early African American, 1650-1800.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Francis, Peter Jr.

1991 Beadmaking at Arikamedu and Beyond. World Archaeology 23(1): 28-43.

1996 Bead, the Bead Trade and State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In Ancient Trades and Cultural Contacts in Southeast Asia. Srisuchat, Amara, ed. Pp. 139-152. Bangkok: The Office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Commission.

2002 Asia's Maritime Bead Trade: 300 B.C. to the Present. Honu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Glover, Ian C.

1990 Early Trade between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A Link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World Trading System. Hull: Centr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ull.

Glover, Ian C. and Bérénice Bellina

2003 Alkaline Etched Beads in Southeast Asia. In Ornaments from the Past: Bead Studies after Beck. Ian C. Glover, Helen Hughes Brock and Julian Henderson, eds. Pp. 92-107. London: The Bead Study Trust.

2001 Alkaline Etched Beads East of India in the Late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Period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88: 191-215.

Goddio, Franck, et. al.

2002 Lost at Sea: The Strange Route of the Lena Shoal Junk. London: Periplus.

Gosden, Chris and Yvonne Marshall

1999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Objects. World Archaeology 31(2): 169-178.

Grave, Peter and Michael Maccheroni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09 Characterizing Asian Stoneware Jar Production at the Transition to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1550-1650. In Scientific Research on Historic Asian Ceramics: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Forbes Symposium at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McCarthy et. al, eds. Pp. 168-204. London: Archetype Publication.

Guy, John

1986 Oriental Trade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 Ninth to Sixteenth Centurie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risson, Barbara

1986 Pusaka: Heirloom Jars of Borneo.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lms, Mary

1988 Ulysses' Sail: An Ethnographic Odyssey of Power, Knowledge and Geographical Dist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enderson, Julian

2000 The Science and Archaeology of Materials: An Investigation of Inorganic Materials. London: Routledge.

Higham, Charles

2002 Early Cultures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Bangkok: River Books.

Hodder, Ian

1987 The Contextual Analysis of Symbolic Meanings. In The Archaeology of Contextual Meanings. Ian Hodder, ed. Pp. 1-1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Entangled: An Archaeolog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s and Things. New York: Wiley-Blackwell.

Iizuka, yoshiyuki and Hsiao-chun Hung

2005 Archaeomineralogy of Taiwan Nephrite: Sourcing Study of Nephritic Artefacts from the Philippines. Journal of Austronesian Studies 1(1): 35-81.

Janowski, Monica

1998 Beads, Prestige and Life among the Kelabit of Sarawak, East Malaysia. In Bead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d Bead Makers: Gender, Material Culture and Meaning. L. D. Sciama and J. B. Eicher, eds. Pp. 213-246. Oxford: Berg.

Jones, Andrew

2002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Scientific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mb, Alastair

1965 Some Observations on Stone and Glass Beads in Early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8(2): 87-124.

Lesure, Richard

1999 On the Genesis of Value in Early Hierarchical Societies. In Material Symbols: Culture and Economy in Prehistory. John E. Robb, ed. Pp. 23-55. Carbondale: Center for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Long, Kerry Nguyen

1992 History behind the Jar. In A Thousand Years of Stoneware Jars in the Philippines. C. O. Valdes, K. N. Long, and A. C. Barbosa, eds. Pp. 25-69. Manila: Jar Collectors.

Mabbett, I. W.

1977a The 'Indianization' of Southeast Asia: Reflections on the Prehistoric Sources.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8(1):1-14.

1977b The 'Indianization' of Southeast Asia: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ical Sources.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8(2):143-161.

Maran, Joseph and Philipp W. Stockhammer

2012 Materiality and Social Practice: Transformative Capacities of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Oxford: Oxow Books.

Nik Hassan Shuhaimi

1991 Recent Research at Kuala Selinsing, Perak. 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11: 141-152.

Sherratt, Sus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99 E pur si muove: Pots, Markets and Values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Mediterranean. In The Complex Past of Pottery: Production, Circulation and Consumption of Mycenaean and Greek pottery (sixteenth to early fifth centuries BC). Jan Paul Crielaard, Vladimir Stissi, and Gert Jan van Wijngaarden, eds. Pp. 163-211. Amsterdam: J. C. Gieben Publisher.

Theunissen, Robert, with Peter Grave and Grahame Bailey

2000 Doubts on Diffusion: Challenging the Assumed Indian Origin of Iron Age Agate and Carnelian Beads in Southeast Asia. World Archaeology 32(1): 84-105.

Thomas, Nicholas

1991 Entangled Objects: Exchange, Material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in the Pacif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van Wijngaarden, Gert-Jan

1999 An Archae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Concept of Value: Mycenaean Pottery at Ugarit (Syria). Archaeological Dialogues 6(1): 2-46.

2002 Use and Appreciation of Mycenaean Pottery in the Levant, Cyprus and Italy (1600-1200 BC).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Voutsaki, Sofia

1995 Value and Value and Exchange in Pre-monetary Societies: Anthropological Debates and Aegean Archaeology. In Trade and Production in Premonetary Greece: Aspects of Trade: Proceedings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Athen 1993. Carole Gillis, Christina Pisberg, and Birgitta Siöberg, eds. Pp. 7-15. Jonsered, Sweden: Paul.

1997 The Creation of Value and Prestige in the Aegean Late Bronze Age. Journal of European Archaeology 5(1): 34-52.

Weiner, Annette B.

1992 Inalienable Possessions: The Paradox of Keeping-while-giving.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